

<<走出中世纪>>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走出中世纪>>

13位ISBN编号：9787309054170

10位ISBN编号：7309054172

出版时间：2007年4月

出版时间：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朱维铮

页数：39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走出中世纪>>

### 内容概要

作为蜚声中外的一流学者，朱维铮教授以其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多元的探索视野和妙语连珠的流畅文字，在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理念的基础上，通过系统连贯的发掘探讨和发人深省的研究思辨，对中国及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作出了独到地阐述，从而充分显示其不仅把握中国历史昨天、前天的学术修养，更体现其关怀人类社会今天、明天的人文精神。

本书二十年前初刊至今，影响持久不衰，亦曾被译为英文，广泛流传。现经作者校订原作，增补大量内容，并从更能彰显历史时空连续性的角度，调整编次，从而成为较初刊更加完整精到的名家名作。

与本书相关之《走出中世纪二集》也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

## <<走出中世纪>>

### 作者简介

朱维铮 1936年出生，江苏无锡人。

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专门史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曾主持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等。

1987年以来先后应邀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担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

著作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与龙应台合作）、《壶里春秋》、《中国经学史十讲》和《孔子思想体系》（合作）等。

## &lt;&lt;走出中世纪&gt;&gt;

## 书籍目录

增订本小引初版序英文版序走出中世纪——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匪夷所思——世纪更替中间的哲人怪想利玛窦在中国 楔子 一 利玛窦圆梦 二 怎样“劝化中国”？

三 是“拓荒”么？

四 渗入王学开拓的空间 五 “慢慢来”的策略 六 目的与手段的倒错 七 关于《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利玛窦与李卓吾徐光启和晚明史 晚明的西学领袖 何以不能称学派？

利玛窦和徐光启 晚明“天学”的轴心 技术救世的成败 附：《历史上的徐家汇》代序给魏忠贤“造神”“红夷大炮”南明史的一部力作十八世纪的汉学与西学 一 “空白”引出的疑问 二 答疑的难点 三 古老学术史的倒演 四 王学与西学 五 尊朱抑王的奥秘 六 南国汉学家的反应 七 汉学与西学的相关度 八 中世纪特色的回光返照 九 隔膜的心态汤若望与杨光先 所谓《不得已》案 满清首任钦天监正 帝师生涯 杨光先发难 传教士内哄 满洲权贵支持更愚昧一方 南怀仁怎样告倒杨光先关于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真理学”、“清官”与康熙“一介不取”？ 满清盛世的“小报告”年羹尧与汪景祺 附：汪景祺《功臣不可为》戮心的盛世 附：上引《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部分译意和破案 附：清嘉庆四年正月十五宣布和坤二十大罪的上谕在中世纪晚期的《三国演义》 讲史小说岂是信史？

满洲文盲权贵的教科书 荒谬的关羽崇拜 由清宫到民间的“三国戏” “你能抵挡他么！” 马纯上和匡超人 《儒林外史》成书于乾隆初说 “以公心讽世之书” 马二先生说“举业” 文坛流氓匡超人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跋几份“反洋教”揭帖历史的孔子与孔子的历史 一 假孔子与真孔子 二 近代三种假孔子 三 “假作真时真亦假” 四 信言有征见真实阳明学在近代中国——由晚清至民国的政见史札记关于早年章太炎——章太炎著作按语一束 《明独》 《读书后》 《译书公会叙》 《视天论》 《茵说》 《公言》 《原变》 《与梁鼎芬绝交书》 《匡谬》 《征信论》 《驳三书叙》 《》 《序》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原学》 《革命之道德》 《无神论》 《论诸子学》 《衡三老》 《悲先戴》 《哀后戴》 《与人书》 《复吴敬恒函》 《代议然否论》 《序》关于晚年章太炎——就“五四”后章太炎思想的札记唯物史观在中国萌芽形态的历史考察——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世纪将复归吗？

——《知识价值革命》提出的疑问跋

## &lt;&lt;走出中世纪&gt;&gt;

## 章节摘录

初版序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著作，其实是近几年我撰写的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部分文稿的结集，包括若干篇短论，若干则随想，以及少量已刊或未刊的论文。

除论文外，收入本书的大部分文稿，当初所以撰写，或为自己弄清问题，或为准备别的论著，本来没有想到成书出版。

同是文字，写给读者看和写给自己看，当然有不同的要求。

既然为了写给自己看，而且多半属于平素随想随记的断片，那就必须在成书时进行整理。

这番整理工夫，费时就达一年。

因为我的时间早被切割成许多断片，怎么硬挤，也没法保持做同一件事而连续几天不致中断。

用断片时间来整理断片文稿，那结果可想而知。

这部著作，无论从全书看，还是从单篇看，都呈现出若断若续的面貌，便是直接的证明。

篇章虽然若断若续，但涉及的问题却似乎不少。

从十六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期，也就是从晚明到晚清，那三百多年间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多种课题，都曾是我关注的对象。

因而，思潮，学说，人物，事件，在本书内纷然杂陈；经学，宗教，科技，文学，在本书内也胥然丛集。

我所以会去扫视如此宽泛的历史田野，除了同我关于文化史分类的认识相联系，仍然也出于为专题研究作准备的需要。

但因此也使本书的部分篇章，主要是那些短论和随想，显得过度的凝缩，凝缩成没有论证过程的结论或疑问。

有几篇论文，可能也给读者以太简约的印象，则是由于撰写它们原为提供同行专家讨论的缘故，另外也由于我自己不爱喝掺水太多的或酸得牙疼的劣酒。

本书讨论的对象，从晚明到晚清的思想文化的历史，在我看来属于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侧面，这个过程就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的过渡过程，我称之为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程。

关于中国走出中世纪过程的研究，在学术界其实早已开展，不过是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名义下进行的，并且受到名义本身的限制。

这场讨论，从我还在做大学生的年代便已开始，此后时断时续三十年，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三十年。

作为旁观者，我觉得这场讨论，固然如有的学者所批评的，存在着一大缺陷，便是先立论，后求证，但也立下了一个功劳，就是将中国中世纪史的研究，推进了，深化了。

推进与深化的表征呢？明显的一点，就是从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主要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角度，去探究从中世纪向近代的历史的过渡，已不限于中国经济史的专门范围，正在多种学术领域内展开。

讨论仍在继续，迄今为止还难下结论，在可以望见的将来或许依然难下结论。

若干问题，包括中国中世纪社会内有没有可能孕育着马克思定义的资本主义的萌芽那样的重大问题，在海内外学者中间继续被提出，被研究，被争论。

那有什么关系呢？一切学术问题，总是通过反复研究，反复争论，才有可能由异趋同，或者竟不可能趋同，但无论如何都有益于揭示历史的底蕴。

比如说，十七世纪中叶前后，中国社会发生过剧烈的震动，那是谁都承认的。

但从上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这次震动的解释，虽然异说纷纭，却不是落进王朝治乱史的陈套，便是陷入观念决定论的旧网。

近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趋向于承认，至少从晚明起，中国社会的确在酝酿一种不同往常的变化，一种明显脱离中世纪旧轨的变化。

这就不能不归功于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

然而，在我看来，这场讨论还受到名义的限制，因而造成了讨论的麻烦，也框住了讨论的视野。

好用模糊的但是流行的概念，应说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一种常见病。

## &lt;&lt;走出中世纪&gt;&gt;

时常可见这样的学林大战:参战双方或三方,拿着术语相同或不同的概念,争论得一塌糊涂,把读者闹得稀里糊涂,最终却不了了之。

原来,谁都不注意概念的涵义精确性,使用的同一概念可能是“同名异实”,使用的不同概念倒可能是“异名同实”,争论成了“聋子对话”。

更不幸的还有呢,那便是大家都用一种概念进行操作,对概念的涵义即名义的理解也不错,因为它具有流行的权威性,却没有注意到这样一来,却被限制在这种概念所表现的狭隘观念之内了。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便可归入这么一类。

不是吗?多年间,有种意见相当流行,就是以为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是母子关系,苗土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必定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胎儿或幼苗,好比圣母玛丽亚无夫受孕而生下圣子耶稣一样。

关于商品经济的这种模糊概念,是旧式苏制教条,明显背离马克思关于资本关系的创造过程的见解。然而,它被引进以后,在我们这里变得更加模糊,似乎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是同一个白骨精的两个化身,岂止一棍子打不死,十棍子也打不死。

对商品经济“来了”的惊慌,在实际生活中造成怎样的混乱,由那十年内乱期间把堵鸡屁股眼当作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壮举,至今还在农村留有“鸡屁股银行”一类好听的术语,便可见一斑。

人们在谈论“史学危机”,在评估传统史学,而往往集矢于清代以来的历史考证学,甚至称它为封建史学。

我以为,如果寻找中世纪史学传统的踪迹,那么找到历史考证学,起码是找错了主要对象。

研究历史,不是首先研究历史本身,不是首先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历史事实,而是首先揣摩上意,密察风向,猜度政治生活上的时样和流行色,再据以剪裁史料,编织史著,涂饰史评,这不正是中世纪晚期的“正史”学风么?这种在近代屡受冲击的传统,一度以“左”的形式复活,给史学造成巨大伤害,不是更值得痛定思痛么?以往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虽然也被迫中断很久,但作为史学界盛开过的一朵花,无疑也不能不受风气影响。

比如,资本关系的创造过程,也就是封建关系的解体过程,不外是劳动者同他所有的劳动条件分离的过程,这正是马克思反复论证的。

但我们的萌芽史研究,很少从这个角度讨论,总把眼光盯住商业和手工业史,审视商品经济的活跃程度,这就不能不说是受到以前那种流行意见的感染〔1〕。

又比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发展过程,给人以强烈的整体感。

与这个生产方式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往上的政治关系和法的关系,以及更高层次的宗教、哲学等,都逃不出他的法眼,从容自如地信手拈来补充主要论证。

因此,他的分析和结论,即使反对者也不敢轻易否认,而以为那属于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体系。

我们的萌芽史研究呢?除了辛苦地在搜索商品经济的材料,便是在计算剥削程度〔1〕。

这些年情况已有改变,商人家族和手工业行会的系统研究,已开始受到重视,但暂时还处于材料清理阶段〔2〕。

这也不能不说受到以往狭隘观念的限制。

因此,我们的萌芽史,即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史,取得的成绩引人注目,但显示只在史料的搜集,个案的研究等;而存在的缺陷也引人注目,主要就是整体研究徘徊不前〔3〕。

为了理解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进程,本来就需要多角度的研究。

道理很简单,社会历史过程本身就是个整体,是个全局,是个时空连续体。

要再现这个过程,倘只从一个角度去考察,即使钻研得很深很细,那也只能反映一个侧面,一个局部。

从这个要求来说,萌芽史的研究,不过只抓了一个角度,而从这个角度看到的侧面还很不完整,怎不令人失望呢?相形之下,从其他角度进行考察的工作,除了思想史〔1〕以外,似乎更难令人满意。

把政治当作历史的主干,是我们史学的一大传统。

照说从政治史角度去探究由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过渡,应该受到充分重视,至少明清史的研究应该如此。

然而直到近十年,把清史当作一个过渡过程打通考察,才正式提上研究日程。



## &lt;&lt;走出中世纪&gt;&gt;

至于从文化史角度去考察，则起步更晚，不过是近几年的事。

我就置身于起步很晚的一个行列。

我认为，从文化史角度讨论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不仅是为了填补研究的一个空白。

研究历史同研究任何问题一样，有时只消变换一个角度，便能获得新的发现。

近几年，我们的研究，纷纷越出自造的雷池，从古代和中世纪的一般精神的高度，去俯视那些时代的各个领域的精神文化及其物化形态，很快就在研究中出现若干突破，就是例证。

但起步终究是起步。

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于讨论对象“是什么”，然后才可能追究“为什么”。

文化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这不是说理论不重要，而是说不能用文化学代替文化史。

我完全同意，只要有利于揭示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妨尝试各种方法。

但最好的方法所以能够获得最佳的成果，无非因为它能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通过详细占有材料，探寻出存在于历史本身中间的种种实际关系。

假如不先弄清“是什么”，便急于回答“为什么”，那么这种回答无论说得怎么头头是道，却总不免令人怀疑这个“道”，只是心造的幻影。

从文化史角度考察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当务之急正是要多问是什么。

本书也就是一个反证。

有些文稿，原先毫无想写的意思。

只因校书注书，需要查考某人生平或某事真相，往往遍索群书，不是毫无所获，便是徒增疑惑，只好自己动手，从材料辑集考订等起码工作做起。

那结果时常大出意外，或者发现通行说法不合实际，或者发现所谓原始记载本不可靠，或者发现貌似小事的后面大有文章，于是便拣了几个问题做成文章。

我的经验自不足道，所得也无非一砖一石。

但我想，建构宏伟大厦总要从一砖一石砌起，要不然便至多一张蓝图而已，这点经验也许可算一个说明。

因此，也就有了本书。

内容呢？当然不过是散砖碎石的集合。

既是集合，就该略显秩序。

于是，在结集时，目录稍加分类，序次依时排列。

全书大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两篇，都是随想和短论的缀合。

前一篇五十则，多半讨论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化问题，也说到了十九世纪，同时还时而回溯中世纪的其他时期。

后一篇则是关于晚明至晚清有关文化人物的随感录，共写了四十三人，主要是些学者和思想家。

无论问题还是人物，我都看作走出中世纪过程里不同色彩的文化表现。

第二部分十篇，属于若干具体历史材料或文学作品的考证。

它们几乎全是过去校书注书的“副产品”。

现在择出并合为同类，除了敝帚自珍外，还由于从中可见那个时代，某些古旧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行为的遗存，给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带来的种种困扰。

第三部分九篇，大都在考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遭遇以后，在走出中世纪过程的不同时期，在中国引起怎样的碰撞和变异。

不过主要限于思想和学术。

其中五篇论文，曾分别在刊物或论文集内发表过。

本书所收文稿，不但篇幅长短不一，风格差异颇大，而且体制也不一律，特别是引文出处有的加注，有的则不加注。

这是原稿的撰写目的和撰写时间都不相同的缘故。

虽然我自信在材料的别择使用上是严谨的，但因此给读者带来的不便，则应深表歉意。

马克思曾就宗教史研究说过：“要由单纯分析找出宗教幻想的世俗核心，比之反过来，要由当时现

<<走出中世纪>>

实的生活关系进而阐述它们的天国化形式，是更容易得多的。

但是只有后者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方法。

”〔1〕我以为文化史研究也应走后一条路。

本书这些零星文稿反映的就是我的尝试。

本书因为在讨论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过程，因而就取名《走出中世纪》。

1987年7月8日于复旦大学



## &lt;&lt;走出中世纪&gt;&gt;

## 媒体关注与评论

走出中国的“中世纪” 《走出中世纪》提炼了1930年代以来的明清史研究，浓缩了中国近代从晚明到晚清的波澜壮阔之进程 南方周末 2007-08-16 14:39:13 每周一书

李天纲 朱维铮先生的《走出中世纪》（增订本）20年后再版，又一次获得读者的赞誉，可见有价值的思想和学术，原来是可以历久弥新的。

回想起来，《走出中世纪》初次出版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1986年，本书以深入凝重的笔调，触动刚从“文革”过渡出来的人心，在“思想解放”的学术界引起热议。

一位经历运动、变得激进的老先生说：中国人自己是走不出中世纪的，只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出中世纪”。

稍后，另一位中年先生则相反，拿了一把西方“经典”尺度，丈量一番后，说中国古代根本不曾有过“中世纪”。

说不要“西方中心”，自己拿的尺度却还是来自西方。

1980年代的思想学术界，光谱很宽，色彩很丰富，对于《走出中世纪》的议论，是一个例子。

对于有着“文革”共同记忆的好几代中国人来说，十年噩梦，一朝醒来，惊怵之后，“中世纪”确实是一个容易唤醒的概念。

经历过那一时期的好几代中国人，在东方的“文革”和欧洲的“中世纪”之间找到某种关联，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是，《走出中世纪》在20年前就不是一本可以拿来当作时髦谈助的“伤痕”类书。

它非常耐读，是专业书，主要的读者还是综合性大学文史哲专业的学生。

复旦大学的学生都知道，朱维铮先生是校园内最为恪守中国优秀学术传统的教授之一，无微不信，无稽不谈。

通观全书可以发现，《走出中世纪》提炼了1930年代以来的明清史研究，浓缩了中国近代从晚明到晚清的波澜壮阔之进程。

《走出中世纪》确实不是一本容易读的书，其中的观念和史实，编织得非常细密，需要相当程度的思想兴趣和学术训练才能慢慢进入语境。

当然，一般读者也能凭着人生的阅历，从本书饱含热情的文字中悟到些什么，但要领悟到更深的意义，先要熟悉近四百年来的明清学术史。

书中“匪夷所思”一篇，是周围很多朋友都喜欢咀嚼的，每一条文字都约到最简，其中包涵的学术意蕴，需要自己用功力去发掘。

例如，第一条“徐光启”说：“他（徐光启）向利玛窦问了西方政教，便想赴欧洲亲自考察一番。

没有成行，那不是他的过错。

假如他真的去了，又回来了，中世纪晚期的思想史，会不会是另一种模样呢？

”在“文革”后的学术界，这是个很突兀的问题。

要知道，1983年国内学术界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周年的时候，很多学者还在回避他与利玛窦的交往，掩盖他的天主教徒的身份，连徐光启从上海到过澳门，见过西洋人的事实都加以否认，生怕一位中国的爱国者，和西方天主教会扯上后就有损形象。

整个1980年代，朱维铮先生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中年学者合作，恢复了1930年代十分兴盛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开创了这项领域的各项教学和研究。

从“文化史”角度，突破“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等传统学科中意识形态的限制，马上有清新可喜的气象，受到学术界的瞩目，纷纷响应，一时涌起“文化热”。

讲授就是写作，用写作的精神来讲授。

这种精神，注重探讨，不计功利，古人称之为“述而不作”。

如今，这种古人精神被计算“论文数”，强调刊物“权威”、“核心”级别的学界所抛弃，却还在《走出中世纪》这样的“札记”类著作中保留着。

《走出中世纪》瑰集的多是真知灼见的“笔记”、“断想”和“考证”，没有一篇是高头讲章式的“

## &lt;&lt;走出中世纪&gt;&gt;

论文”。

出版后，在一次“谈学”中，我问过朱老师，“在今天动辄以大部头空头著作唬人的年代里，（《走出中世纪》的札记体形式）显然有一个重要的学风问题，您如何看待？”

”朱老师戏称这样的高头讲章，就像是个虚假的“大头娃娃”，不过就是晃来晃去而已。

最近20年里，学术界的“论文”产量大幅度提高，学术行政单位所属各级学术刊物的学术声誉却渐渐破产。

因循、重复、剽窃、抄袭、卖版面、吃作者、榨基地，各种各样的丑闻层出不穷，究不胜究。

相反，倒是出版社、报社和一些公众型的刊物为了兼顾读者面和发行量的考虑，刊发着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作品。

像朱老师这样的前辈学者，完全置身于当代“名利场”之外，仍然不加入这场无规则的游戏，还是一如既往地“述而不作”，写着自己的“札记”，在几家遂合心意的刊物上发表。

朱老师的《走出中世纪》，和他以后的一系列作品，都是这样写作的。

如此境界的“述而不作”，鼓励了很多有志于学术的后辈。

转眼之间，《走出中世纪》出版已经二十年了，离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年代的结束，也已经三十年了。

这二三十年里，好几代的学者努力“走向未来”（《走向未来丛书》语），“走出文化封闭圈”（张隆溪语）。

现在的中国学术界，已经“换了人间”，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社会既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也产生了很多新问题，这些都不言而喻。

但是，变化的方向是否真的如当初学者们的设想，当今中国的现状是否真的已经不再“封闭”，是否真的完全不需要再对“中世纪”怀抱忧虑，这些都是大可怀疑的。

中西悬隔，时空跨越。

一种历史，比如说“中世纪”，不可能在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中重复开展。

换句话说：欧洲的“中世纪”和中国的“中世纪”天然不同，拿欧洲标准量世界，保持“西方中心论”，当然都是肤浅的。

但是，以中国历史学问为根基的学者讲“中世纪”，天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必由“反西方中心论”者来提醒。

朱老师的学问，是从中国历史的深处出来的，他在《走出中世纪》中讨论的，当然是“中国的中世纪”，不是欧洲标准的“中世纪”。

其实，只要真正摸到历史的脉络，讨论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欧洲历史的概念，如“中世纪”，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借鉴，而“标准”、“定义”都退居次要。

正因为如此，在《走出中世纪》这样的著作中，我们可以从晚明到晚清的近代历程中，看到很多人性和社会的大问题。

<<走出中世纪>>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